

导言

2020 年伊始，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为应对这一罕见的大流行病给公共卫生、经济、社会与国际关系带来的挑战，世界各国都依据各自国情，采取了不同的防控举措。为了厘清各国抗疫的思路、机制及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联合开启了“博雅德信工作坊：外交官眼中全球疫情观察与分析”系列线上研讨会。

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东南亚地区在悄无声息中成为了新的疫情暴发点。疫情给许多东南亚国家的生产、生活和消费带来严重影响，旅游业、零售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的冲击最为显著，大量从业者失业，地区经济增长受到抑制，部分民众特别是贫困人口的处境艰难。

进入 5 月后，东南亚地区新冠肺炎疫情趋于缓和，多国开始重新评估疫情防控形势，相继逐步放松限制性措施，努力恢复生产、保障民生。有专家指出，东南亚国家疫情防控一直呈现良好态势，得益于许多国家在疫情初期便及时、严格地采取社交隔离、宵禁、关闭营业场所等措施，大大降低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量。东盟与中日韩（10+3）在抗疫合作中展现出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精神，为地区抗疫做出巨大贡献。本期工作坊邀请到中国前驻马来西亚大使胡正跃、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常春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教授宋清润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

文化、公共卫生等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讨。

“博雅德信工作坊”第35工作间

外交官眼中的全球疫情观察与分析：东南亚

2020年5月31日

本期工作坊由中国前驻马来西亚大使、前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胡正跃做主旨报告。

胡正跃大使指出，东南亚是中国南大门，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个重要方向和依托。东南亚疫情形势总体可控，且控制得比较成功：10个国家共6亿多人口，截至目前共感染83400人，累计死亡2600多人，有6个国家死亡人数在100人以下：越南、老挝、柬埔寨零死亡，缅甸死亡6人，文莱2人，泰国57人。柬埔寨、老挝、文莱、泰国的治愈率都在90%以上。与东北亚、南亚、非洲特别是和欧美地区相比，东南亚在抗疫方面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胡大使认为，以下因素促成了东南亚目前的抗疫局面。

第一，政府强势，响应到位。东南亚10个国家的国情有很大的差别，但它们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越南行政效率高；老挝和柬埔寨则主要是靠积极争取对外合作，洪森首相最早决定将几千名柬埔寨在华留学生留在中国，他认为留在中国比回国更加安全；泰国的医疗系统一贯以来都比较完善；新加坡总体上体现出“从容应对”；菲律宾采取了强制性的社交隔离。各国共同的特点是政府主导得力，政令畅通，第一时间果断决策。当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马来西亚进行了一次公众集会，涉及较多的人；新加坡外来劳动力聚集

点防护条件较弱。但是这些是百密一疏，总体上控制及时，并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第二，老百姓积极配合。东南亚地区各国老百姓都能尊重和配合政府的安排，社会秩序总体良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抗、闹事、哄抢物资等事件。这其中有几大原因。一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东南亚老百姓较为自律是最大的优势之一。二是东南亚和中国一样有抗击“非典”时积累下来的经验。三是社会条件允许，除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外，东南亚其他9个国家都有广阔的农村作为后盾，日常生活不成问题，就业压力相对不大。四是东南亚经历过的危机和灾难比较多，综合承受能力远远高于西方国家。

第三，应对机制较为健全。由于东南亚和中国一样有过“非典”的教训，加上东南亚地区也是登革热和某些疾病的流行地区，所以各国特别重视制度建设、社会动员，以及救治能力的提升。新加坡之所以能够从容应对就是因为“非典”之后建立了科学、合理的防范体系，这方面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有备才能无患，东南亚各国警惕性高，响应的措施就能及时到位，及时跟进。

第四，和中国沟通合作良好。东南亚第一时间向中国伸出援手、第一时间和中国互通信息、第一时间赞成在万象召开“10+1”外长会议。2月10日，中国领导人和东盟多国领导人分别进行了通话，双方还进行了专家视频等一系列的沟通，防疫举措非常及时、管用、有效。中国医疗队最密集的派出地区就是东南亚，至少包括缅甸、老挝、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等5国。东南亚国家在具体的应对措施上大多

复制或参考了中国的经验和做法，这是一条正确、有效的捷径。东南亚地区和中国在抗疫合作这个问题上是顺势而为，没有一国参与到所谓的“反华大合唱”中。东盟 10 国一直在用实际行动力挺中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将疫情和特定的种族相联系的国家领导人。当然，挺中国也是挺自己，西方有一些人歧视亚裔，也冒犯了东南亚各国公民。因此，东南亚和中国站在一起是正常的现象，东南亚和中国合作抗疫是命运和利益相连的必然反应。

第五，区域合作推动。东盟内部召开了不同层级的各种会议，分别同相关国家举行了“10+1”会议，还举行了最为重要的东盟加中日韩的“10+3”领导人会议。这些会议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谈，而是有共识、有行动、有方向的务实合作；不仅面对当前的抗疫行动，还包括未来在健康领域的合作安排、人员交流、经贸合作等更为长远的设想和考虑，内容丰富，及时有力，稳定人心，凝聚共识，认清方向。要特别指出的是，今年越南是东盟轮值主席国，在协调区域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高效的作用，对此应予以肯定。

胡大使认为，抗疫合作对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关系的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感情上更近了。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支持。这次抗疫明明白白地体现了合作是正确方向，合作是主旋律。

二是政治上更加坚定。双方在同一条船上患难与共，携手合作是正确的选择，通过这次共同抗击疫情，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又一次经受住了历史性的考验。

三是合作的需求更加突出。旅游经济的恢复、农产品的

市场拓展、产业链的对接、“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总体区域合作推进等，都是双方利益的重要结合点。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进则两利退无可能。

四是从全球范围看，中国需要立足周边，团结东盟、合作东盟，东盟也需要巩固对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互利合作共赢关系的潜力很大、天地很宽、前景很好，关键是要看下一步双方做的怎么样。随着疫情的缓解和逐步好转，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交往与合作应尽快地筹划起来，逐步、逐项地审慎恢复，积极协调，成熟一项推进一项，重振旗鼓再出发。

新冠肺炎疫情对东南亚经济造成了冲击，首当其冲是旅游业、酒店、航空等服务行业。此外，国际油价下跌、金融市场波动、制造业和转口贸易萎缩等都对本地区的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胡正跃大使认为，东南亚经济是东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欧盟市场关系密切，只有东亚好，欧美好，东南亚才能从根本上恢复元气，这显然是需要时间的。另一方面，自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经济的韧性变得比较强，其经济结构中农业占了很大的比重，疫情本身并没有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复工、复产难度较小。东南亚在第三季度逐步走出困境，逐步恢复发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和其他地区相比，东南亚的经济或许会更好一点。

胡正跃大使对后疫情时期的东南亚形势进行了研判。他认为，东盟各国都会“自扫门前雪”，致力于本国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是可以理解和预见的，但这些国家会走

出一条自己的路。

政治方面，东南亚国家将有三件大事。第一是越南明年要召开的“十三大”，今年是筹备的关键之年；第二是马来西亚的政局仍处于复杂的演变过程中；第三是缅甸今年底的大选。上述三个国家都是东盟的重要成员国，和中国方方面面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应当给予适当的关注。总体上看，后疫情时期的东南亚地区将在政治上保持相对稳定。

经济方面，东盟各国之间既有合作，同时在农产品出口、吸引外资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竞争。不过，东盟在内外外部都有成功、有效的协调机制，因此经济上的良性竞争是东盟国家的共同追求。

东盟的对外总体目标仍然是维护地区稳定和持续发展繁荣。南海问题上肯定存在利益纷争，但是局势失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各国将致力于通过谈判取得积极的进展。同时，东盟内部仍旧致力于加强一体化的进程，寻求外贸合作也是东盟各国的重中之重。疫情之后，东盟对中日韩的借重，或者说东盟加中日韩的“10+3”合作会更加引起各方的重视和全力经营。东盟 10 国都在积极地寻求对华合作，同时也会面向日韩，面向世界。涉及到每一个具体的国家，各国政策也都有不同的侧重，但大的方向应该是保持和推进合作。东盟和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好几对“10+1”的合作，但是相比之下，和中国的“10+1”合作应该是最为紧密的，因为中国 14 亿人口的市场无人可及。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东盟贸易逆势增长，已经达到 1900 多亿美元。此外，东盟还会

继续推进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早日签署，一旦成功将有利于世界经济合作方向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进行发言。

许利平认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危机驱动性，越有危机的时候合作动力就越强。由于冷战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曾充满着不信任，但在有了危机之后，大家找到了合作的动力和切入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因为中国表现出了大国风范，提出人民币不贬值，并且帮助东南亚国家抵御危机，与当时一些落井下石的西方国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出现了一个 180 度大转弯。由此，才有了 2002 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 2003 年中国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等一系列突破。2003 年的“非典”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同抗击，印度洋海啸中，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也是共同合作，同舟共济。此次疫情再次通过危机加深了双方的合作，其中最主要的是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习近平主席与和东南亚很多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通话，派遣了医疗队、共享医疗信息等。这种合作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进一步增进了双方的政治互信。

抗疫合作带来的最重要的机遇之一是提升了双方的数字经济合作。2020 年是中国和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数字经济合作表面上来看比较虚，但这次疫情的发生却体现了数字经济合作是实实在在的。比如说今天召开的云会议，中国和东盟国家开展疫情诊疗视频会议等等，都和数字经济相关，

疫情使与数字相关的很多经济活动得到了充分的提升。同时，中国和东盟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性合作举措，给世界作出示范。比如最近中国和新加坡准备启动“绿色通道”，加紧恢复两国经贸往来，这一措施可以在东南亚国家中进行更多探索，使双方交往迅速恢复。

许利平提出，在积极合作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一些挑战。第一，虽然东南亚主流社会在这次疫情抗击中对中国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但其互联网及社交媒体在西方媒体的影响下对中国仍存在一些负面情绪，包括对中国一些历史问题的炒作。这实际上不利于中国和东盟国家关系的发展，需要予以正视。第二，南海问题的挑战。南海问题并不是中国和东盟关系的问题，而是中国和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双边关系问题。但是局外因素使得南海问题树欲静而风不止，实际上也对中国形成了一些挑战，对此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第三，这次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中国和东南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也毫无疑问地受到影响，如何应对冲击也是双方需要共同面对的。第四，东盟国家中缅甸、越南、马来西亚都面临着政局的变化，对此也要做好准备。

东南亚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也是“一带一路”的交汇区。这次疫情对“一带一路”项目影响不大，雅万高铁在顺利推进，预计明年将会完工。现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对雅万高铁信心满满，并且宣布将把雅万高铁延伸到泗水，这是非常积极的信号。另一个“一带一路”的重要项目——中老铁路也在顺利推进，并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这是中国需要进一步拓展的方向。

总体来说，东南亚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地区。在后疫情时代，国际形势将发生大变革的背景下，应准确评估东南亚地区的形势，以及东南亚和中国关系的新发展和新挑战，早做预案、共同面对。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副主任常春教授从卫生角度详细解读了东南亚的抗疫情况。

常春教授根据数据报告指出，东南亚地区没有形成疫情的巨大蔓延，对社会的经济、秩序及发展没有造成太大困扰，并且新加坡的抗疫行动还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评价和认可。她认为，各个国家的检测基准、要求及能力不一样，实际情况和数据并不是 100%没有误差，但是总体形势是多方面情况的反应，数据只是一个方面，还可以结合整个社会状况、民众的感受、周边的情形来共同判断当前面临的情况。

在抗疫措施方面，常春教授认为，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传染病防控应该遵循三方面的原则，也是各个国家都要遵循的科学道理。首先是保护易感人群。易感者是非常庞大的人群，现在提倡戴口罩，勤洗手，不要到人流密集地方去，因为在这些密集的地方难免存在易感染的人群。其次是切断传播途径。东南亚国家的疟疾是通过蚊虫叮咬传播，所以如何防蚊就成了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者的重要举措。新冠肺炎是呼吸道传播疾病，因此阻隔呼吸道飞沫是切断传播途径的重要方面。第三是控制传染源。是谁将疾病传出去的？如果人是传染源，一个重要的方式是控制和隔离，不要再跟易感者接触；如果是动物传播的疾病，则要把动物昆虫尽可能地进一步消灭。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和人们的文化有密切的关联。

东南亚的文化中，人们比较自律，愿意尊重政府的安排和决策。但是在疫情刚刚开始阶段，欧美也面临着疫情暴发的风险，但他们的民众却称“无自由吾宁死”，可以不戴口罩，但是要追求自由。中国有自己的特色，基层组织非常健全，小区管控、单位管控、包括大家的自觉遵守都形成了强大的力量，对疫情的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

常春教授特别提出了新加坡的抗疫经验。早期新加坡并不要求每个民众都戴口罩，而是要求已经确诊新冠肺炎的病人及有发烧、咳嗽等相关症状但还没有确诊的人士出门必须佩戴口罩，其他老百姓则可以不用戴口罩。新加坡的做法不仅有利于节省资源，而且有助于树立一个不仅对自己的健康负责，还应该对社会、对他人的健康负责任的理念。人们既要关心自己，也要关心社会，承担社会的健康责任，这样一种行为倡导长久发展，对社会是有重大贡献的。事实证明，尽管新加坡在疫情防控方面没有施行全民戴口罩，但疫情也控制得挺好。她认为，新加坡的这种严格治理，有着历史的积淀。中国的人口比较多，民众文化程度的提高、对健康的重视及责任的培养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国家要求所有人必须佩戴口罩。未来经过发展，中国社会也可以形成更加关心自身、关心社会、承担更多健康责任的理念。

常春教授表示，此次疫情再次强化了“健康”的理念。新冠疫情的暴发对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影响，经济方面、就业方面，甚至是产业结构方面都需要调整。健康关乎着从个人到家庭、单位、社会、国家的各个不同领域。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视察的时候第一次提出了“没有全民健康，

就没有全面小康”，这句话也点明了健康跟整个国家的发展都有关联。公共卫生是一个特别宽泛的领域，更准确的理解应该称为“大众的健康事业”，或者“大众健康的公共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讲，涉及到整个人群健康的事务都可以算在公共卫生的范畴内。它不仅包括“饭前便后要洗手”的公共倡导，也包含垃圾分类、街上公共厕所布局的要求。它与环境、食品、疫苗、药物有关，也和每个人有了健康问题后能否得到足够保障有关，所以它是谋划大局的一件事。医疗是如何使用合理的手段和相应的技术去解决一个人的病痛问题，更加偏向生物学领域，而公共卫生则不同，它是一个社会领域的问题。比如最近在讲的“大头娃娃”事件，它是一个健康问题，但从源头上讲则牵涉到产品生产是否合格，销售方是否有误导行为以及老百姓的理解是否有误区等多个方面。这次疫情也是一样，从公共卫生角度看，需要考虑它产生的原因是否和人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有关联。

常春教授指出，健康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各个部门的工作、不同政策和项目都可能对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修建青藏铁路时在铁路下方建通道，让藏羚羊通过，这样看是保护生态，而保护生态其实是为了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最终对于人们本身的生存发展，包括健康都有重要意义。在一些公路、铁路等基础建设过冲中，还可能会出现由于对原始的或者原来没有人居住的地方进行开发，从而造成鼠疫或者其他传染病出现的情况。因此，健康是和多方面因素有关的，公共卫生也秉持这种策略和思想。目前公共卫生倡导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中，各方面都应给予关注。此

外，在国际交往中也应关注健康问题，一方面健康问题对国际交往有影响，反过来国际交往对保障健康也是能发挥作用的，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联。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教授宋清润在发言中主要关注三大问题。

第一，中国及东南亚国家恢复交往后可能出现的疫情反复问题。近期中国和东盟已经开始考虑逐步恢复中国和东南亚的人员交往，包括航班及其他交往形式。的确，东南亚疫情开始出现了好转，整体可控。疫情之下东南亚国家和民众在经济社会发展及就业等问题上的承受力已经到了一种极限，但一些国家的检测覆盖面是不足的。中国国内也在讨论秋冬季或之后是否会出现疫情反复的问题。他认为，随着东南亚国家的复工、复产、复市、复航，中国和东盟人员交往也将逐渐恢复不断增多，对此应保持忧患意识，做好预案，有备无患。

第二，新冠疫情为中国和东南亚的贸易合作带来新机遇，但与此同时，也要针对未来中国和东盟全面恢复交往将面临的各类细节困难做好准备。比如中国和东盟人员往来恢复后的健康码区域认证、人员便利通行及合作的恢复与对接等问题，都需要从细节入手，付出时间和精力进行应对。

第三，中国和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机遇出现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随着数字经济合作增多，中国和东盟的诸多电商、数据中心及数据服务商，掌握了中国和东盟十多亿人口的私人信息，保护个人隐私的要求随之而来。二是东南亚地区继续成为中美在 5G 等数字经济领域技术标准竞争的

最前沿。中美两套技术和体系的竞争博弈会愈发激烈，对东盟甚至全球体系的变化有较大影响，需要进一步跟踪研究。三是地缘政治和国际格局方面，东盟也成为了中美博弈的前沿。目前中国在东盟和国际格局中有了更多的优势，但要保持清醒，要准确地把握整体形势，对中美博弈的复杂性有更理性的认知。比如说美国真的像有些媒体说的那么狼狈不堪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或者诬蔑会更加激烈，除了将疫情防控不力的“锅”甩给中国，在南海加大挑衅力度外，最近又传出美国想将 7 国集团扩大成为 10 国集团的消息，拉帮结派围堵中国的力度明显加大。美国未来可能还会有类似的招数对付中国，对于美国在全球和东南亚制衡和打压中国的现实情况，要有充分的认识和应对方案。

2021 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友好关系三十周年。进入后疫情时代，中国和东盟如何勾画好并实施好未来 30 年的合作蓝图，需要双方现在就开始进行思考和准备。

互动环节中，与会嘉宾与现场听众就上述发言进行了讨论。

提问：请教胡正跃大使，此次东南亚的疫情危机对在东南亚投资的这些企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胡正跃：电力合作是中国和东南亚合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为相关国家的发展注入了很大的动力。目前电力合作的对象国主要是老挝和越南，越南现在的发展势头很好，很多电力设施都是由中国南方电力公司提供的，在越南中部、南部还有一些电力项目在探讨当中。中国和马来西亚在 20 年前已经开始了电力合作。现在既有国有企业，也有大型私营

企业在不断地开拓东南亚市场。

我认为中国和东盟有关国家的基础设施或者电力合作不会因疫情影响而中断或受到冲击，但双方此前在对接过程中已经存在的或者发现的问题还会继续存在。总体来说，他们的需求很大，我们的优势很大，前进的方向和需求是不会改变的。但也要具体项目具体分析，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我主张进行更多对接。电力项目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首先加强企业和政府间的沟通、交流、协调是最为重要的。其次，要寻找到一个可靠的、有前景的合作伙伴。第三，一定要符合当地的法律，要解决好对方关注的社会问题或者环保问题等。

电力合作有着很大的市场，同时面临着来自日本、韩国还有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国有 14 亿人口，东南亚有 6 亿人口，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电力合作不仅仅是合作，实际上有共同发展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我认为对这个问题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前瞻地看，前景很好。我鼓励中国的企业，包括中国的学生多去东南亚走一走、看一看，把事情做扎实，把调研做扎实，把项目做扎实，一步一步推进，不要气馁、不要放弃。疫情的影响是有限的，合作的需求是有广阔前景的。

提问：请问常教授，下半年学校可能派学生到东南亚国家及斯里兰卡、印尼等国家实习。根据您现在的研究和评判，下半年东南亚国家的疫情发展会是什么样的？如果学生出去的话，您有什么建议？

常春：疫情的走向比较难以预测。第一，它与病毒有关

联，现在发现病毒变异比较多。第二，各个国家的疫苗正在研究当中，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前几天报道我们国家陈薇院士的团队在疫苗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是从第一期临床到最后疫苗量产并真正能够保护人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我个人对9、10月就能够进行疫苗量产并不乐观。最后，在病毒变异的情况下，疫苗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仍有待观察。

我从两个方面进行建议。第一，由于病毒力量有减弱的趋势，其传播应该不至于仍旧很强，同时各个国家的预警报告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个人的警觉性和防护力也有所增强，因此下半年疫情不会发生大规模暴发，但出现散发病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每个人还是应该保持一定的警觉，更加注意个人卫生。

第二个方面，不同国家的疾病的流行情况是不一样的，因此建议学生去之前先查询这个国家卫生健康方面的数据，特别是传染病方面的数据。其次，要遵循国际旅行中的预防接种原则。中国对到哪些国家要事先接种哪些疫苗是有明确规定的，同时有一些国家对于外来人员也有接种疫苗的要求。第三，不同疾病有不同的传播途径，我们首先要知道主要有哪一些流行病，知道这个病是什么缘由及相应的传播途径，并在指导下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这样才能保护好老师和同学们，不至于造成严重的伤害。

提问：我来自山东德州学院东盟研究中心，我们现在跟马来西亚联系很多，比如说中国东盟商务协会总会，但和他们交往的时候沟通有问题，反应太慢，特别着急。请胡大使

给我们一些启发或指导，和他们交流、交往、研究问题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胡正跃：我个人认为你们的合作伙伴应该不是一个企业，而是某一个负责这方面事务的、相对能做点事情的群众团体。马来西亚有马中商务理事会，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马中商务理事会也是第一个站出来号召援助中国都，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我认为中国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合作不应局限在华人公司之间的合作，应该更高一点，更全面一些。这方面新加坡做得非常好，苏州工业园这么成功就是因为中、新双方领导人的关心。你们和其他国家的合作不一定都推到国家层面，但是必须要有一个适当的合作和对接的对象，我个人建议你们和马中商务理事会要有多一些的联系。

总体而言，我们和东南亚国家合作要防止因为“熟人好办事”、“语言方便”等原因局限在只和华人联系，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主流的社会阶层。所以我认为你们要从根本上考虑问题，请使馆商务处给你们提一点建议，找几个有权威的、有动员能力的、能及时处理和解决问题的一些机构来对接，可能会更好。

提问：请问钱老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东南亚研究在瘟疫、自然灾害的问题上有没有拓展？想怎么来做？第二个问题请问胡大使，在疫情之下中国的公共外交，特别是涉及到舆论这一块能做些什么？我们做了什么？下一步怎么做？第三个问题请问许老师，印尼疫情数据的可靠性受到质疑，可能是一个隐患。不知道许老师有没有更精确的数据或自己的判断？第四个问题请问宋老师，明年是中国东盟

建立对话关系三十周年，现在的议题主要是由东盟或者日韩这些国家在设计，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如何在议题设计中发挥作用，使东南亚或者日韩关注这些议题，并带到东南亚、东亚的实际当中去？

胡正跃：东盟国家都是我们的邻国，中国的疫情它们很关注，它们的发展我们也很关注，中国和东南亚称得上是命运共同体或者利益相关者。首先，我认为最好的公共外交是领导人之间的交往，这个做得非常突出。第二，“10+1”外长会议或者“10+3”领导人会议，是为了双方的合作和利益进行的协调机制，这种协调本身就是对公众很好的交代，也树立了很好的形象。第三，东南亚毕竟跟中国山水相连，所以我们在科学的交流、安排及对话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认为这就是公共外交，因为大家都看得见。最后是实实在在的幫助。柬埔寨洪森首相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来到北京，他说“我的三四千学生放在中国，不让他们回柬埔寨更加让我放心。”通过他的举动，中国老百姓对柬埔寨的认识会进一步增强。

我认为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最重要的是争取人心，是舆论引导，是巩固双方之间的信任。从地方层面看，各地要和所有 10 个国家的民间团体加强联系，加强双方省与省之间、省与市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另外要着眼青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最后还是要落脚到年轻一代人之中。东盟大量留学生在中国，我们应该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例在中国的东盟国家的留学生有什么抱怨和问题，这就是公共外交。所以只要想做，可以做的事情

很多、条件很多、方式很多、途径很多，公共外交是国家工程，我们大家应共同努力，方方面面共同来做。我本人也做了一些事情，特别是在有关的东南亚国家报纸上发表我们的一些立场、主张等。我认为公共外交最重要的就是争取人心，要把中央的精神贯彻到我们具体的事务当中去，办法还是有的。也希望你们多和我们中国公共外交学会联系，我们一起来做工作。

许利平：印尼抗疫确实受到了外界的质疑。疫情刚开始暴发时，印尼报告的是零感染，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现在的官方统计数据大概是2万多例，死亡率是东南亚最高的。现在外界认为印尼官方的数据并不是太准确，因为印尼有2.6亿人口，1.7万个岛屿，分布范围非常广，统计的难度非常大。目前印尼官方的数据大概是30万人接受了核酸检测，检测的范围是非常小的。因此官方的数据只能作为参考，并不能反应现在印尼疫情的全貌。

我对印尼的疫情比较乐观。虽然它的数据不太准确，但总体来看疫情还是可控的。目前来说，印尼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治安状况还是平稳的，在有序的抗疫过程中。印尼是世界上第四大人口国，抗疫任务非常重，但它有两个优势，一是气候比较炎热，有人说气候炎热对抗击病毒是有一定帮助的，虽然这不一定有准确的科学依据，但至少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一部分印证；二是印尼有一些传统的草药，对抗击疫情有一定作用。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土办法，印尼也是一样，对印尼的情况不用过于悲观，总体上来说还是可控的。

宋清润：总体来看，疫情增强了中国和东盟、日本、韩

国等国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区域合作气氛未来会更好。但是过去三十年中，无论是在理念上、合作议题上还是机制引领上，东盟始终掌握着区域合作的主导权。长期以来，它对中国、美国、日本等大国在地区合作当中发挥太大作用心存怀疑。所以中国在引领地区议题或者区域合作机制上力量要适度，态度要谦和，避免引起东盟的疑虑和反弹。东盟和中日韩“10+3”的合作，以及中日韩自贸区的推进，各国都要商量着来做，平稳推进。未来中国可以在区域卫生合作上发挥引领作用，可以尝试提议和东盟及日韩在医药物资和设备生产上进行合作，中国有经验和产业优势，这一点可能是比较受欢迎的。

钱乘旦：宋老师刚才说的一番话里面确实有非常深刻的道理。中国在和东盟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千万不能高调、不能自大、不能自以为是，我们要谦虚，多做实事，多解决问题。不仅和东盟国家交往的时候应该这样，和世界其他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交往时更应该这样。

关于你的问题。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是北京大学关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一个平台，是面向全校、为全校研究外国问题的学者和老师们提供的一个合作平台。我们的学术力量并不是在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而是在全校。我们依托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非常有力、埋头肯干、勤勤恳恳的工作团队，为全校老师们服务。建院以后我们每年都有招收博士生的名额，刚建院这几年我们主要招了两个方向的博士生，一个是中东问题的研究，一个是中亚和俄罗斯的研究，明年开始我们准备招收东南亚方面的博士生，欢迎全国有志于区域国别

研究的青年学生们报考。

提问：新加坡的疫情防控做得非常好，跟踪机制非常完善，但后来它的疫情还是暴发了，因为忽略了外来劳工群体。现在东南亚各国的主要防疫政策是一关了之，将国门封锁住，在自己境内控制住。但是下一步要恢复经济，重启经济发展就不得不面对人员流动的问题，包括各国国内的人员流动，以及国际跨境人员的流动。请问在防疫常态化的情况下，经济重启后该如何面对人员流动的问题？东南亚各个国家之间的发展非常不均衡，防疫的能力、检测的能力差别都非常大，面对这些问题时是否有一个很好的处理办法？

胡正跃：东南亚 10 个国家中真正称得上发达国家的大概只有新加坡。在防控疫情的过程中，新加坡有自己独特的做法，效果总体是好的。它一开始对外来劳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后来疫情一发生马上进行了全方位的跟进，做法上不是绝对的隔离，而是维持了原来的基本方案，到现在为止死亡的人数才几十人，和“非典”的时候比感染的人数增加了，但是死亡率大大减少了。我们仍然可以认为新加坡是做得很好的。新加坡有条件这样做，越南却没有这样的条件，但是越南的效果也很好，它有制度的优势。越南和我们一样，已经落实到每个村和每个人。所以要因地制宜，取决于它们基本的区情，基本的国情。

涉及到我们和有关国家的联系也是如此，我们要因国施策，每个国家要有不同的有针对性的办法。我们要有畅通的沟通渠道，我认为这次整个疫情的处理过程中，驻东盟 10 国大使和大使馆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对象国总统、外交部、

各个社会团体及普通百姓都保持了良好的沟通。昨天中国副外长罗兆辉已经和越南副外长进行了电话沟通，信息量很大，涉及到方方面面。和东盟的关系确实是一个综合的、立体的、多方面的关系，各方面的利益太密切了，所以我们要把事情做细、做扎实、做到点子上，这样才能一一地解开各种难题，这不是我们一个国家的事情，是整个地区的事情。另外，我认为中国和东盟的交往合作要放在整个亚太地区来看待，放在我们整个周边外交当中来看待，放在我们和整个世界的交往中，也就是大的国际格局当中来看待。中国和东盟的关系非常细腻，但是我有信心，我觉得我们的前景是好的。

许利平：刚才胡大使的回答我非常赞同，我补充几点。第一，我认为在防疫常态化的背景下首先要做的工作是舆情管控，这非常重要。我刚刚谈到，在东南亚国家的一些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声音，特别是把疫情与某某种族联系起来，实际上对当地政府在处理和中国的关系时产生了一些影响，甚至是负面的冲击。在东南亚的中资企业要复工、复产，一些中国的工人需要到东南亚工作，所以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进行舆情引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第二，针对商务相关人士采取绿色通道的方式，解决影响双方经贸往来的一些问题。第三，采用常规的手段遏制新冠疫情的蔓延，包括共享防控信息，甚至未来在疫苗生产及检测等方面继续深化和加强合作。

常春：首先，疫情常态化需要全球都做好准备，大家必须有一个常态化防控的思想，很多疾病不是说控制住了，从今往后就没有事了。第二，目前很多国家都在做检测，做防

控，东南亚国家的举措相对来讲比较接近。在经济压力之下大家要复工、复产，要开门、交往，这是必然的，疫情小幅抬头也非常有可能，毕竟是传染性疾病。如果我们能够持续保持现有的警觉性，加强国际间的信息共享，遵照旅行卫生法的相关准则承担各自的责任，通过技术手段及多国协商，就有可能通过相关举措解决后续问题。

提问：请问常老师，东南亚有 10 个国家，它们的经济发展情况千差万别，有一些已经是发达国家，有一些是比较贫穷的国家。这么多国家不同的公共卫生体系及应对手段是不是会对疫情的防控有决定性的影响？还是说它们的设备或者手段并没有起那么大作用？

常春：我认为这其中有能力上的差异，有经济发展程度、老百姓受教育程度、健康意识及自我保护程度上的差异。比如口罩大家都需要，但是口罩是需要买的，因此在供应能力等方面各国是存在一定差别的。从技术上看，虽然试剂盒、检测技术、防控和治疗手段可以实现全球共享，各个国家之间也能够保持信息畅通，但在不同国家各项措施能否做到足够好也是存在差别的。不同国家在防控过程中还是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所侧重。我们国家早期出现了医疗资源挤兑的现象，一些发达国家看到后，采取的政策是鼓励那些症状较重的人进行核酸检测，而不是对大范围的人检测，由此导致疫情大范围扩散。同样，对于那些医疗服务能力和检测能力尚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的国家，做好公众防控，让更多人感染就显得更加重要。各国应该根据自身的特色采取对策，不同国家有自己的经验，大家可以互相借鉴，但要具体

情况具体对待。

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教授对本期工作坊进行总结。他认为此次会议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会议追求一种系统性，这个系统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系列会议邀请到我国重量级的大使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疫情表现，各地区和国家的应对措施，以及由此带来的政策性、学术性的影响。研讨对象包括了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及拉美和东南亚地区，使我们对世界上各个地区疫情情况和应对有了全景性的了解。另一方面，每一场会议都特别邀请了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参加，所以这种系统性也表现在跨学科上。

第二，会议体现了非常明显的地区性。胡正跃大使对东南亚的实际情况，应对疫情的具体操作，以及公共外交方面做了完整和细致的梳理，使大家在半个小时内掌握了一个全景图。宋清润老师和许利平老师分别从自己的专业视角在某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阐释，比如东亚和东盟地区所特有的转危为机的特点。常春老师介绍了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教育和培养的问题，她讲到要把公共卫生健康注入到各个层面去，这是一个特别有启发的话题，并且在回答问题过程中说到了东南亚卫生治理政策方面的情况。总体感觉东南亚地区各个国家在疫情防控方面较其他地区是相对成功的，这也体现出地区性比较明显的特点。

第三，此次会议体现了明显的地方性。会议特别邀请到全国不同地区做东南亚研究的一些院校和研究机构，他们各自具有明显的特色。

最后，会议具有后续性，因为大家都提出了很多现在没有答案的问题。例如，我们对疫情今后的发展预测是不确定的。东南亚地区虽然治理得非常好，但是会不会出现反复，会不会出现一些其他变化？需要地区性和专业性的结合才能把这个问题做得更加清楚。另外，刚才常春老师讲到了公共卫生健康政策注入的问题，这可能是今后中国和东南亚交往其中的一个重点。这同样需要公共卫生专业、国际关系专业，以及区域与国别研究专业的合作才能做得更好。现在无论政策上还是学术上都特别需要这样的交叉研究尽快涌现。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明年将开始招收东南亚方向的博士，同时还有博士后的项目。研究院特别支持跨学科的研究，不只是文科之间的跨学科，还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跨学科。我们希望尽快把这些工作做起来，这样更有利于未来在相关问题研究中作出应有的贡献。